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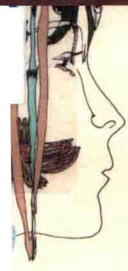


吴格非 蒋栋元 主编

多元文化视野下的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为
中国矿业大学2017年学科基础建设项目
“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下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方向内涵建设”
成果

多元文化视野下的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吴格非 蒋栋元 主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元文化视野下的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 吴格非,
蒋栋元主编.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305-19991-2

I. ①多… II. ①吴…②蒋… III. ①比较文学—文集
②比较文化—文集 IV. ①I0-03②G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0236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多元文化视野下的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主 编 吴格非 蒋栋元
责任编辑 洪 洋 张 静 编辑热线 025-83685720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23 字数 523 千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9991-2
定 价 85.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前 言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学科代码:0502Z1)是国务院学位办于2013年正式设置的二级学科方向,隶属于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2014年9月经国内专家组评审、校学术委员会评议论证、报教育部批准和备案后,中国矿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获得招生资格(二级学科名称: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学位授予单位名称:中国矿业大学;学位授予单位代码:10290)。2016年9月本学科方向正式开始招生。目前,我校在该学科点上有导师5人。其中教授3人(含美籍教授1人),副教授2人,导师队伍中有博士学位者4人。目前,本学科在国内外同时招生。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基于比较文学、比较文化学、跨文化交际学、文学批评理论、译介学、人类学、传播学等理论,涉及国际文学关系、跨国文学比较、文学传播与接受、文学与文化翻译史、形象学和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等领域。从2014年建立学科以来,本学科导师团队积极探索学科的基本特点,加强与国内外相关机构、学者的合作交流,先后组织召开国际学术会议一次,组织召开国内高层学术论坛一次,每年邀请数十位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前来讲学;与英国杜伦大学跨文化研究之心、加拿大拉瓦尔大学人文学院、美国阿帕兰恰州立大学建立了稳定的合作交流关系;在学术研究方面,结合国家政策与社会发展需求,不断凝练学科特色,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形成了以下四个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

(一) 国际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

以比较的方法开展国别文学研究(主要是英语国家文学)、比较文学理论与文论研究,以及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涉及文学与政治思想、宗教哲学、历史地理、经济环境等文化领域的关系研究;在跨文化视野下开展对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的研究。

(二) 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海外传播与接受研究

在“一带一路”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框架下,开展对海外汉学和国际中国学的研究,以及对中国文学与文化走向世界的实践与理论研究;通过对海外中国文学与文化学的研究,探索中国文学与文化在海外的价值观内涵和演变形态;用英语或其他外国语进行研究和阐释中国思想文化的方式和方法,开展中西思想文化的对比研究,进而展开西方汉学与中国本土文化研究的互动交流。

（三）多元文化背景下文学的人文教育功能研究

在跨文化视野下探讨不同国家、地区文学作品的人文教育功能,以及对提升文学的现实地位的重要意义;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背景下,探讨表达人类共同情感与追求的文学所承担的更为重要的历史责任和社会价值。

（四）舆情、政策与话语研究

依托我校国际能源政策研究中心,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政策、能源高等教育、社会舆情等课题开展研究;依托我校澳大利亚研究中心(教育部备案),开展澳大利亚的语言政策与多元文化发展研究;对当下国内外发生的有国际影响的中西文化冲突现象和案例进行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新一轮全球化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之间的人才流动和文化交流也日益紧密和深入。同时,国家关于“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启动实施、统筹推进两个一流战略”,为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学科发展提供了国家支持和目标。本学科在人才培养中,倡导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研究,授课内容与培养进程与国际接轨,致力于培养具有扎实语言文化基础和国际化视野的“中外通”。同时,也为促进高校在公共外交、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与国际地位方面发挥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学生经过3年左右的研究性学习,主要达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培养目标要求:

第一,语言文化能力。学生至少熟练掌握包括母语在内的2~3种语言,能够阅读本专业文献、撰写学术论文。其中,学生需要具有良好的英语阅读和表达能力,能够参与课堂学习研讨。同时,熟悉了解中国和研究对象国(尤其是英语国家)的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提升多元文化素养。并且掌握基本的跨文化交际知识,具备从事跨文化交流的基本技能,培养国际视野。

第二,知识水平。学生能够通过学习,对本学科方向的国际文学关系、国际文化比较、国际中国学、海外汉学等理论和学科知识具有较为深入系统的认知和理解,了解掌握本学科领域的发展态势。

第三,学术水平。通过语言学习与学术训练,学生应该能够熟悉本学科学术研究的术语和研究范式,运用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相关理论撰写学术论文。在比较文学与文化、海外汉学、国际中国学、跨文化研究等方面形成一定的知识积累,并选择个人研究方向,独立运用英文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毕业论文答辩。

加强学科研究、提升学术水平是提高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障。为促进学科发展、增进学术繁荣、顺应“一带一路”国策,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学科积极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夯实学术基础,增强师资力量,提升办学水平,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发表学术论文、出版学术论著、创办学术刊物。据不完全统计,自本学科方向2014年成立以来,专任教师已发表和出版的学术成果中,有国际国内期刊论文近30篇,专著译著等10余部,成功申报各项课题10多项。本学科正在规划出版系列跨文化研究丛书。这次征集出版的论文集是其中之一。其主要亮点是,本论文集得到了国内外众多本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的鼎力支持,荟萃了文学、文化、翻译等方面的力作30篇,真实反映了当今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研究的最新学术动态。本论文集分为“跨文化视域中的文学与话语研究”“国际文学关系研究”“海外汉学研究”三个栏目。作者中既有来自本学科领域的领军人物,如长

江学者、清华大学王宁教授,长江学者、南京大学何成洲教授,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带头人、上海师范大学朱振武教授,长江青年学者、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郝田虎教授,知名人类文化学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王海龙教授,也有许多在本学科领域取得显著成就的中青年学者。他们的倾情奉献使本文集出彩增色,得到了学术升华;同时,也对我们的学科建设做出润物无声却也铿锵有力的帮助和鼓励,促使我们不惧困难,再接再厉,努力奋进,推陈出新。对此,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学科的全体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我们坚信,有诸多志同道合的学者做坚强后盾和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有信心把本学科办好,同大家一道,为我国的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做出贡献。

编者

2018年5月8日

目 录

跨文化视域中的文学与话语研究

面对文化研究的挑战:比较文学的未来	王 宁 / 1
全球化与文学:视角、立场与方法	何成洲 / 13
《天堂》的历史编码和政治隐喻	荆兴梅 虞建华 / 22
跨文化视阈下祖先崇拜与上帝崇拜的阐释	蒋栋元 / 31
Ghosts Writing History: Magical Realism and Identity in Chinese and Black American Novels	Kate Rose / 41
超越性别的进步和裂隙——发展地理学视域下的 D.H.劳伦斯与《虹》	曾利红 / 57
英国文艺复兴诗歌中的五感传统	邢锋萍 / 65
从拟人化到主观性:新历史主义视角下《青灰色石质土》的文本性解读	谢长宗 吴格非 / 75
走出童话的世界:A.S.拜厄特《孩子们的书》的家庭伦理解读	贾宇萍 苗勇刚 / 83
在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林语堂信仰阐释的文化传播意义	薛媛元 / 92
原乡记忆与文化认同——哈金中国题材作品中的地域色彩研究	唐书哲 / 101
应神生活时代与王仁献书《千字文》考论	张德恒 / 108
现代与后现代性:中国电影改编的《哈姆雷特》	唐仁芳 / 115
从中文姓名英译“失范”看中西话语冲突	翟石磊 陈 猛 / 125

国际文学关系研究

- 加勒比英语文学在英美的研究热点与诗学构建 朱振武 周博佳 / 136
- 跨越东西方:辜鸿铭与吴宓对弥尔顿的接受 郝田虎 / 144
- 英国文学与徐志摩的理想追寻 吴格非 / 159
- The Immortal Stor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wenty-First Century Chinese and
British Story-Collectors Anna Fancett / 183
- Acceptance and Metamorphosis: From Ji Junxiang's *The Orphan of the Zhao*
Family to Voltaire's *L'Orphelin de la Chine* Synopsis of *The Orphan of the Zhao*
Family Guo Rong(国荣) / 202
- 美国《金瓶梅》研究综述与思考 黄文虎 / 213
- 灾难中开出的爱情花朵——论《霍乱时期的爱情》对《一九三七年的爱情》的影响
..... 孟 欢 卢 婧 / 224
- 《聊斋志异》在德语世界的译介与研究考略 何 俊 / 233
- 略论《诗经·关雎》四个法译本的形式、情节与主题 孙 越 / 244

海外汉学研究

- 作为思想史构成的汉学略论——文化人类学之汉学巡礼 王海龙 / 257
- 王光祈《旅欧杂感》所述德译汉诗集《中国桃花》及相关史实考 ... 陈从阳 李银波 / 272
- 东方主义还是汉学主义? ——埃兹拉·庞德中国知识生产的性质之辩
..... 高 博 / 285
- 英语世界的汉代儒学研究概述 孟庆波 / 293
- Shaped by the Tao and Master Kung—the Remarkably Chinese Characters of Lin
Yutang's *Moment in Peking* and Pearl S. Buck's *The House of Earth* Trilogy
..... Zuzana Dudasova / 318
- 英国汉学家德庇时的中国小说观念研究 吴慧敏 / 338
- 毕来德与于连围绕汉学之争的述评及思考 赵 鸣 / 352

面对文化研究的挑战：比较文学的未来

王 宁*

内容提要：正如我们所知，文化研究的特征体现在与传统的精英文学研究的对立，因为它所指向的是大众的非精英文学和文化现象，而这些现象通常并不为文学研究者，或具体说来，比较文学学者所关注，同时也因为文化研究对比较文学学科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但是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又不无一定的互补性和对话性，具体体现在它对重新建构一门新的比较文学学科所做的重要贡献。传统的文学研究者过去不屑研究的东西现在却成了同时进行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应该认识到，并非是文化研究占领了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地，而恰恰是文化研究拓展了文学研究固有的领地并为之增添了一些文化因素，因为文化研究的重要一支就来自文学研究。本文作者将揭示一些英美具有代表性的比较文学学者是如何在致力于文学研究的同时也进行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的。在作者看来，他们的跨学科写作为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的交流和对话铺平了道路。文化研究在消解并颠覆有着鲜明欧洲中心色彩的比较文学学科的同时，也对一门新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学科的重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它也通过给既定的经典增添一些非经典取向的东方文学作品而使得世界文学的重新构图成为可能。

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化研究；世界文学；全球化

Title: Confronting the Challenge of Cultural Studies: The Futur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bstract: As we all know, cultural studies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opposition to (elite) literary studies not only because it points to popular or non-elite literature which is usually not dealt with by literary scholars or more specifically, comparatists, but also because it severely challenges the disciplin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On the other hand, cultural studies complements literary studies with its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a sort of n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 What were not touched upon by traditional literary

* 作者简介：王宁，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外国语言文学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致远讲席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西方文论和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电子邮箱：wangning@tsinghua.edu.cn。

scholars are now studied by cultural studies scholars who are at the same time doing comparative studies. In this sense, we should realize that it is not cultural studies that has occupied the domai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but rather, it has expanded its traditional domain and inserted some new cultural elements. This paper illustrates how some of the representative Anglo-American comparatists are also doing cultural studies or cultural criticism while engaged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The author observes that their interdisciplinary writings have paved the way for effective dialogues between literary studies and cultural studies. Therefore, cultural studies, in deconstructing and subverting the old established discipline of Euro-centric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as made positive impact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a new disciplin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It has also made it possible for the remapping of world literature by inserting in the canon some non-canonical oriental literary works.

Key Word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ultural studies; world literature; globalization

Author: Wang Ning is Zhiyuan Chair Professor of Humanities a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nd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Tsinghua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cover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Western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Email: wangning@tsinghua.edu.cn.

在当前的全球化时代,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对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内发生的事情感到忧虑。确实,我们不得不面对我们的学科里出现的这样一些现象:一方面,文学研究的疆界变得越来越宽泛,越来越多的学者不研究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另一方面,传统的(精英)文学研究的领地却变得越来越狭窄,以至于大学里的一些文学课程濒临消亡。这些现象究竟是如何出现的?他们认为文化研究必须为此负责。实际情况果真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文化研究天然就必定与比较文学研究相对立吗?如果情况确实如此的话,那么文化研究将加速比较文学学科的终结吗?本文将回答上述问题,并试图为保持本学科的活力而提出一些建设性的策略。在我看来,比较文学的未来前景依然是光明的,它的最高阶段就是世界文学,对于比较文学在未来的发展,文化研究将作出一些建设性的贡献。

文化研究的兴起及其对比较文学的挑战

既然文化研究是一门非精英的跨学科研究领域,那么它所研究的对象主要就是当代非精英文化产品,因此人们常常认为它与精英文学研究是天然对立的,特别与欧洲中心主义意义上的比较文学截然对立。众所周知,早期的比较文学学者必须具备很高的资质,也即他们必须掌握好几种主要的欧洲语言和广博的文学知识,因而很少有文学研究者被人们看作是“比较文学学者”(comparatist)。但当今时代,随着全球化时代文学产品的数字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宁愿阅读网上的电子书刊,而不愿沉浸在图书馆里阅读纸质的书籍,而且他们似乎对研究非精英文化,比如大众文化或消费文化现象更感兴趣。但尽管如此,我们

仍然不能忘记这一事实：英国文化研究的不少先驱者，比如利维斯、霍尔和威廉斯等，早期也曾是成就斐然的文学研究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内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并且由于其深厚的文学造诣和丰硕的文学研究著述而成为著名学者。但是他们，不满于日益萎缩的精英文学研究，因此便和其他学者呼吁扩大文学研究的疆界，把研究的触角指向那些从来就为人们忽视的文化现象，诸如种族族裔、性别问题、大众传媒、身份政治、社区生活等。而相当一批比较文学学者则攫取这些话题，并尝试从自己的视角来对文学作品进行重新阐释，从而得出了一些新的洞见。他们的努力无疑弥合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鸿沟，为建构一种文学的文化学研究铺平了道路。因此毫不奇怪，在一些美国大学里，不少比较文学学者只是借比较文学之名义从事文化研究的课题，比较文学学科只是他们的“饭碗”和职业。甚至在世界文学课堂上，学生们也不读原著，而是通过阅读英文译本来了解各国/民族的文学。因而在今天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界，我们时常听到返回语文学（return to philology）的呼声。当然，人们完全可以说，上面提及的这些学者后来都成了英语世界主要的文化研究学者，除了威廉斯之外，他们成名之后便很少再从事文学研究了，但是既然美国的文化研究与英国的文化研究有一些差别，那么我们也照样可以在美国学界的一些典型的文学研究者的著述实践那里找到另一些例子。

乔纳森·卡勒是当今极少数对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都有着精深研究并且成就斐然的美国学者之一，他无论在机构内还是在治学上都是典型的比较文学学者，他虽然没有进行过具体的文化研究，但他也曾对文化研究产生过浓厚的兴趣。在那本篇幅不大的《文学理论简介》中，他花了整个一章来讨论文学和文化研究。卡勒在承认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差别后指出，“在这里发生的一个事件就是‘文化研究’，它是90年代人文学科的一个主要活动。一些教授或许已经从弥尔顿转向了麦当娜，从莎士比亚转向了肥皂剧，进而全然抛弃了对文学的研究”（Culler, 1997: 42）。在他看来，这一事实自然对传统的（精英）文学研究形成了严峻的挑战。但是尽管如此，卡勒并没有对这种现象横加指责，而是试图从文化研究实践中找出一些对文学研究有利的东西。他在书中指出，

但是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在这样一个最为宽泛的概念中，文化研究的项目在于理解文化的功能，尤其是在现代世界，文化生产在生活于一个多样的、混合的社群中的个人或群体，以及国家权力、媒介工业和跨国公司之中是如何运作的，文化认同又是如何建构和组织的。因此就原则上说来，文化研究包含并囊括了文学研究，它将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实践来审视。但是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包含呢？这里便引发了大量的论证。文化研究是一个可以使文学研究获得权益和洞见的宽松的项目吗？或者说文化研究将吞没文学研究并破坏文学吗？要把握好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了解一些关于文化研究发展的背景。（Culler, 1997: 43）

显然，他的这番话代表了美国学界相当一部分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学者的开放思想和包容性胸襟。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卡勒本人长期致力于比较文学教学和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是如此，在建制上也一直属于英文和比较文学系。他曾担任国际比较文学协会执行局成

员和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主席,并两度出任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是公认的一位有着强烈精英意识的比较文学学者。但是即使如此,他仍然十分清醒地意识到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所面临的挑战。在上面两段引文中,我们可以发现文学研究者的一个焦点转换:从致力于经典文学研究转向通俗作品的研究。但是卡勒仍然不赞同把文学研究置于与文化研究相对立的位置,尽管这二者对于文学经典的态度截然不同:前者试图维护经典的权威性,后者则企图通过重构经典来削弱既定的经典。他也和其他许多学者一样,认为文学研究者完全有可能在一个广阔的文化语境下从事文学研究,这样就有可能建构一种文学的文化学或扩大了内涵的新的经典。显然,他的努力已经使得比较文学这门老学科焕发了新的生机,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不断有人声称比较文学处于“危机”状态,甚至直接宣布这门学科已经“死亡”。

如果我们说,卡勒的研究主要是西方文学及其理论,很少关注中国的文学现象,因此对中国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还有着一定的隔膜,那么另一位比较文学学者苏源熙(Haun Saussy)的研究和著述则可以说明问题。苏源熙除了精通西方数种语言并有着广博的文学知识外,同时又是一位汉学家,他近年来越来越关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问题。但作为一位比较文学学者,他始终坚定地认为,“比较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赢得了战斗,它从未在美国学界得到更好的认可”(Saussy, 2006: 3)。确实,在关于比较文学是否将被各种“理论”或文化研究吞没的辩论中,比较文学最终还是幸存了下来并且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一点完全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见出端倪:争论已经结束,比较文学具有合法性,而过去则不太具有合法性,此时我们的学科扮演的是为乐团的其他乐器定调的第一小提琴的角色。我们的结论已经成为其他人的假设(Saussy, 2006: 3)。这番描述虽不无夸张之嫌,但依然无可争议地说明了比较文学在当前美国的人文学科中所起到的实际上的导向作用,但是,他马上却又表达了对我们这门学科中出现的一些奇怪现象的担忧:

但是这一胜利并没有给学科带来什么明显的回报。比较文学学者在自己狭小的、自我选择的专业的实验室里所精心谈论和讨论的东西已经走出了自己的领域进入社会,并且赢得了那些对比较文学的机构并无特殊忠诚的人们。这是一个令我们满意同时也不无几分沮丧和不安的平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我们现在都算是比较文学学者,但只有微不足道的共同点。很少有人认为自己主要的职业是比较文学学者,偶然进入的或暂时的比较文学学者是不会放弃自己的日常工作的。(Saussy, 2006: 4)

很显然,苏源熙上述的这番话意在告诉我们,今天的许多比较文学学者实际上在文学教学之余更多地从事文化研究,例如电影研究,后殖民研究,性别研究,大众文化研究等,因而使得传统的精英取向的文学研究变得不那么纯正了。另一方面,当今的许多比较文学学者实际上只是在机构内利用自己的职位做其他的工作:他们为学生讲授文学课,但是写的东西却是自己感兴趣的另一些话题。显然,比较文学正在失去自己的身份和学科意义。由高雅文化产品构成的传统的文学经典已经被后殖民的和非西方的文学作品弄得“混杂”(hybridized)了。也即,今天的比较文学研究已经和文化研究融为一体,其代价是比较文学

的领地越来越狭窄,学者们的研究课题越来越远离文学。这一点倒与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界和比较文学界的情况有些相像: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学者热衷于远离文学文本的理论话题,甚至把研究的触角伸向日常生活的审美现象。我认为这既是坏事也是好事:精英取向且同时充满了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比较文学学科自然应该消亡,然而正如斯皮瓦克所预言的,一门新的与区域研究携手合作同时又具有“跨学科”(Spivak, 2003: 15—16)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已经同时在西方和东方诞生(Wang, 2006: 149—163)。可以说,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的复兴和繁荣就证明了这一点(Wang, 2006: 149—163)。

文化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 对立还是对话?

关于文化研究与比较文学的互动和对话关系,我早在十年前就已作过论述(Wang, 2001: 55—66),但是由于当今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已经有了崭新的面貌,世界文学问题再度浮出历史的地表,并且日益显示出其前沿性和理论性,因此我在此还是得就这个问题作进一步阐述。毫无疑问,对许多文学研究者而言,比较文学的前景并非光明,因为文化研究的挑战仿佛要把这门精英取向的学科全然吞没。确实,当今时代文化几乎无所不在,而日益萎缩的文学却近乎淹没在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更何况比较文学了。众所周知,文化上的全球化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后果,它的特征体现在这一事实中: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念,正在全世界广为传播。因此在全球化的时代,欧洲文化也照样受到无所不在的美国文化的影响,所造成的结果便是,世界文化正变得越来越趋同,弱势文化的民族身份也变得越来越模糊。所以毫不奇怪,这一企图受到另一股力量的抵制:文化上的本土化。实际上,文化全球化若不与特定的民族文化相作用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点已经被当今的诸多事实所证明。可以说,中国比较文学在过去三十年的复兴和发展所依循的路径就是一条全球本土化的路径,正是这样一条发展路径才使得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得到国际学界的瞩目。

因此,我们注意到,只要文化全球化的大计仍在向前推进,那么它就必然受到文化本土化尝试的抵制。世界文化实际上就是在这两股力量的对峙、对话和协调中发展的:二者时而交流和对话,时而摩擦和冲突,但最终还得通过协商和谈判而达到共存和共融。这样看来,我们完全可以预言,在全球化的语境下,21 世纪的新的世界文化格局将体现这样的特征:不同的文化在一定的程度上对话和共融,而非像塞缪尔·亨廷顿于 1993 年所预言的那种单一的“文化冲突”(Huntington, 1993: 22—49),对于这种新的世界文化格局的构图,我们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将大有作为。

在这样一种文化语境下,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比较文学已经且将继续扮演一个独特的角色:既然世界文化仍然朝着多元的方向发展,那么比较文学学者就必将对世界文化与文学的未来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在 20 世纪上半叶,随着美国的崛起,欧洲中心主义早已宣告破产,但是它很快摇身一变以西方中心主义的面目出现。作为东方的比较文学学者,我们充分地认识到,东西方文学和文化的比较研究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决不可急功近利。中国文化和文学必将跻身世界文化和文学之林,但这一天的到来绝非一朝一夕,而是

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不仅要挑战袭来已久的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还要为我们自己的文学经典跻身世界文学而努力奋斗。因此我们可以说,尽管在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变成了一个很小的“地球村”,人们可以轻易地在这个村子里进行交流,但比较文学依然大有希望。它的未来前景就体现于世界文学的重新兴盛,对此本文将在最后一部分详加阐述。

作为一种文化建构和审美再现,文学使我们并将继续使我们在东西方的语境下建构各种形式的乌托邦。当代人不可能仅仅满足于丰富的物质生活,他们还要以不同的方式来享受精神文化生活。因此他们希望在这个后现代社会能有多种选择,这也正是歌德于1827年勾画出他的具有乌托邦色彩的世界文学的设想的原因所在。他广泛阅读了大量的非西方文学作品,其中包括一些在今天看来属于边缘的中国文学作品,^①尽管如此,他仍然从中窥见了一些与欧洲文学的伟大传统相通的东西。在当今时代,文学虽然对人们不再有以往的那种吸引力,因为人们所面对的选择和诱惑实在太多了,但是文学却能向他们提供其他文化再现形式中找不到的那种独特的高雅情操和审美快感。既然经济可以从西方朝向东方而“全球化”,那么为什么文化就不能从东方向西方“全球化”呢?东方文化在历史上不也曾经有过辉煌的遗产吗?从历史上看,强大的经济并不一定就能带来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产品,尽管后现代社会使人们有着多种选择。我们文学学者在进行文化研究时,应当对各种文化现象的影响抱有一种批判的态度,并且始终用文学材料作为分析的对象。因此我在此提出的论点就在于这一事实,也即狭义的文化研究的一支,在某种程度上就直接来自文学研究,尤其是崛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是如此,因为该学派旨在以批判的眼光来分析人们的社区生活并指向通俗文学和文化的研究。

多年前,我在考察加拿大文学理论家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在当代文化研究中的先驱作用时曾指出,在当代文化研究的众多实践者中,弗莱是极少数具有远见卓识并把文学研究置于广阔的文化研究语境下的学者之一。^②今年正适逢弗莱一百周年诞辰,在弗莱的故乡加拿大多伦多市将举行高规格的弗莱国际研讨会,我本人除了在会上要追踪弗莱的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外,还要强调他的遗产对当今的文化研究和比较文学的现实意义。在我看来,弗莱是公认的比较文学学者,但是即使在他最沉溺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批评实践时也从未脱离文化的因素。他从未忘记自己是一位加拿大学者,并在致力于研究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和建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的年代里,还为有着后殖民因素的加拿大英语文学摆脱英美的阴影而努力。他生前不仅具有某种“关怀的神话”(myth of concern),而且还具有对全人类的一种世俗的关怀。比较文学学者十分关心的正是这一现象:在今天的全球化氛围中,文化研究中讨论的许多论题已经越来越远离文学研究,文学研究实际上受到文化研究的严峻挑战,而后者正变得越来越强势,并越来越指向通俗文化。因此毫不奇怪,一些带有传统观念的比较文学学者为比较文学的未来忧心忡忡,因为这门学科正受到严峻的挑战,大有被文化研究吞没之危险。但我仍然认为,通过拓宽比较文学研究的视野和研究领域,弗莱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完美地结合为一体,应该说,他的批评和著述实践,实际上为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共融提供了可能性的典范。他的理论和实践影响了整个两代文学研究者,包括新历史主义理论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以及年轻一辈的世界文学学者弗朗哥·莫瑞提(Franco Moretti)。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人为对立应当消解。

关于文化研究的源头,我这里需要提及的另一个例子就是英国的精英文学和文化研究者学者利维斯(F.R. Leavis),他被公认为当代文化研究的早期开拓者,尽管他的精英文学观和文化理论在今天早已不合时宜,但其影响仍在。对于利维斯而言,文化总是掌握在少数知识精英手中,利维斯为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代言并不难理解,但另一点不难理解的则是他试图通过向普通大众提供一个经典文学的阅读书目来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在他看来,唯有通过阅读这些经典文学作品,普通的人才有可能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因为文学可以塑造更加完美的个人,文学通过提供审美快感来教育和启迪人们。显然,当今时代这种启蒙的大计已经不合时宜了,因为文学本身近年来一直处于萎缩状态。尽管后来的文化研究学者早已超越了利维斯的精英文化理论之层次,但他们却不能忘记他在把文学研究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语境下考察所起到的开拓作用。在利维斯之后,文化研究为什么能得到迅速发展,其原因就在于,后来的文化研究学者走出了利维斯主义的精英文化研究模式,把研究的触角指向广大人民群众,因为他们在“消费”文化并且欣赏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但他们仍不会忘记利维斯的文化奠基作用。

诚然,文化研究的定义很多,我这里参照西蒙·杜林(Simon During)的定义,因为这一定义在中国的语境下被人们广为引证。在杜林看来,“文化研究并不像别的东西那样是一门学科。它既没有一种界定完备的方法论,也没有清晰划定的研究领域。当然,文化研究就是对文化的研究,或更为具体一些,就是对当代文化的研究”(During, 1993: 1)。按照这一基本的定义,文化研究包含的范围非常广,其中种族和族裔研究尤其探讨的是后殖民和流散现象,性别研究则关涉女性甚至女同性恋及怪异研究,区域研究关注的是某一特定区域,如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象,而传媒研究则尤为关注当代社会的大众传媒甚至互联网的作用,等等。应该说这些都与文学多少有关,但却没有什么密切的直接关系。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又可以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其一是对文化本身进行理论探讨和反思,其目的在于建构各种形式的文化;其二是指向当代通俗文化甚至消费文化,从而使更多的人得以享用文化产品;其三即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视角来探讨文学研究,而非像传统的文学研究者那样从形式和审美的视角来研究文学。毫无疑问,通过文化研究的影响和冲击,比较文学的领地大大地拓宽了,文学研究中注入了诸多文化分析的成分。既然文化研究中讨论的许多论题都来自文学研究,那么我们为什么还会认为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截然对立呢?

显然,比较文学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事实,即从事比较文学决不能把自己局限于狭窄的文学领地本身,因为在当今时代文学的空间也越来越广大了,曾经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一些东西今天已经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文学的殿堂,传统的文学理论正在被更具有包容性的文化理论,或曰理论,所替代,因为后者更接近文化研究。我们的比较文学学科也是如此。因而我始终认为,比较文学研究在其最高级的意义上应该以一种跨越语言、跨越文化和跨越学科疆界的方式来进行。它不仅仅要关注形式主义意义上的“文本”,还要关注社会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文本”或“语境”。我们比较文学学者在进行文学研究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研究如果不涉及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是无法深入进行的。但是这种研究必

须从考察文学现象入手,经过跨学科的理论分析之后再返回文学,这样便对文学理论本身也做了必要的补充乃至重新建构。弗莱、利维斯和卡勒等文学-文化研究者们的实践以及所取得的成就无疑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和国际比较文学协会最近几届年会的主题也反映了这一趋势,在这些会议上,文化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学者们的发言也超越了仅仅对文学现象本身的考察和研究,拓展到了对文化问题的反思和批判性分析。我们十分欣慰地发现,比较文学学者至少在同一个层面上和文化研究学者一起挑战旧的研究范式。对此,人们也许会感到困惑不解:面对上述诸多挑战,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又是如何呢?我将在最后一部分作出描述。

走向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的未来

在当前的国际比较文学界,特别是随着文化和文学上的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讨论世界文学问题已经成为最前沿和最重要的理论话题之一。它不仅吸引了众多的比较文学学者,同时也受到文学理论界的关注。在中国的语境下,这一论题也同样吸引了文学和文化研究界的广泛注意。^③但是对于世界文学在当今究竟意味着什么仍然引发着讨论甚至辩论。显然,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是歌德于1827年和艾克曼的谈话中提出的一个带有浓厚乌托邦色彩的假想,但实际上,德国作家魏兰率先使用过这一术语。而且早在歌德之前,世界上不同的文学之间就已经有了彼此之间的交流,在启蒙时代,欧洲甚至出现过一個朝向世界文学的发展方向,但是有着开阔的世界主义胸襟的作家和思想家歌德最早发现了这一规律,并做出了自己的理论建构和实践。尽管如此,在歌德的时代,世界文学只是一个乌托邦的想象,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沿用了这一术语,以此来描述作为全球经济资本化之后果的资产阶级文学生产的“世界主义特征”。显然,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世界文学”的提及来看,其内涵要丰富得多,它包含了文化和知识生产的因素,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个方面:文化的方面。比较文学学者在谈到世界文学时,总喜欢从歌德说起,因而歌德也就成了比较文学的一位先驱者。我们今天从学科的角度来看,便不难发现,世界文学实际上就是比较文学的早期阶段,它是经济和金融全球化之于文学的一个产物。但是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的比较文学学者并没有沿着歌德的思路走下去,反而使得这门本应更为开放的学科领地变得越来越萎缩,正如弗朗哥·莫瑞提所讥讽的那样,长期以来,“比较文学并没有实现这些开放的思想的初衷,它一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知识事业,基本上局限于西欧,至多沿着莱茵河畔(专攻法国文学的德语文学研究者)发展,也不过仅此而已”(Moretti, 2000: 54)。由于受到一种欧洲中心主义以及后来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的主导,世界文学一度成了西方文学的另一个名称。这无疑是导致比较文学陷入危机之境、其领地变得日益狭窄的一个直接的原因。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客观上为欧洲中心主义的解体推波助澜,尽管它也加强了美国的霸权,但终究为各民族/国别文化和文学之间的交流和对话提供了新的可能。为了弘扬全球化时代文学和文化研究的作用,世界文学问题再一次被提了出来,而且大有帮助比较文学学科走出危机之境地的作用。但是正如莫瑞提所言,“世界文学不能只是文学,它应该更大

[……]它应该有所不同”，而且“它的范畴也应该有所不同”(Moretti, 2000: 55)。在他看来，“世界文学并不是目标，而是一个问题，一个不断地吁请新的批评方法的问题：任何人都不可能仅通过阅读更多的文本来发现一种方法。那不是理论形成的方式；理论需要一个跨越，一种假设——通过假想开始”(Moretti, 2000: 55)。在世界文学的重新构图过程中，我们应当具有一种比较的和国际的视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文学研究中取得新的进展。应该看到，世界文学问题的提出，对中国乃至整个东方的比较文学学者有着尤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有利于长期以来被忽视甚至被“边缘化”的东方文学引起学界的关注从而从边缘向中心运动。

在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下，随着全球文化和世界英语的重新布局，再次强调世界文学建构和重建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今天的比较文学界，传统的民族/国别文学的疆界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没有哪位文学研究者可以声称自己的研究仅仅限于单一的民族/国别文学研究，而不涉及其他的文学或社会文化语境，因为文化和文学思潮已经打上了区域的甚或全球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来，世界文学同时也意味着“跨国的”(transnational)或“可翻译的”(translational)或全球的意义，因为它具有共同的审美品质和深远的社会意义。在文学作品的旅行和流通过程中，翻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翻译的中介，许多经典文学作品就只能在另一文化和文学传统中处于边缘地位，甚至死亡。

当我们谈到世界文学时，我们通常采取两种态度，也即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普遍主义：前者所强调的是不同的民族/国别文学所具有的平等价值，后者则更为强调普遍的和共同的美学和价值判断标准，这一点尤其体现于文选的编辑和翻译。尽管各种形式的世界文学选集，尤其是在英语世界流通甚广的《诺顿世界文学选》(*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和《朗文世界文学选》(*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经常用这一术语来表示一个大体上属于西方的经典的的市场价值，但是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这个概念在吸引人们的文学兴趣的同时也弘扬了文学的价值。因此，在这方面，世界文学的重新提出不仅有助于传统的比较文学学科走出困境和危机，它同时也为文学经典的重新建构提供了新的可能。此外，世界文学本身也可用于说明文学的客观影响及流通范围，应该说，我们对世界文学概念的这一理解比较接近歌德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本来的意思。同样，在考察文化上的全球化加速时，人们很容易仅看到它所带来的趋同性特征，而忽视其多样化的方面，而实际上，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文化的多样性特征会变得越来越明显。世界文学也是如此，它不可能只有一个版本或一种形式，因此“世界文学”在西文中的表达既是单数(world literature)同时也是复数(world literatures)：前者指它所具有的共同美学和评价标准，后者则指不同民族/国别的文学所具有的民族和时代特色。

对于文学读者和研究者而言，要阅读和欣赏世界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赖翻译。即使是韦勒克、斯皮瓦克、佛克马、戴姆拉什这样掌握了多达十几种语言的欧美比较文学学者，也不可能用原文来阅读所有的世界文学杰作。因此，翻译便成了一座作品得以走向世界进而跻身世界文学之林的不可缺少的中介，确实，翻译可以帮助优秀的文学作品在另一文化语境中广为流通从而有可能跻身世界文学。正如瓦尔特·本雅明所指出的，“由于译作晚于原作，同时也因为重要的世界文学作品从来不可能在其诞生之日就觅见所有选定的